

張大可文集

第六卷

史記二十誨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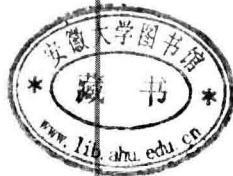
張大可文集

第六卷

史記二十講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二十讲/张大可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张大可文集)

ISBN 978-7-100-09391-0

I. ①史…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  
传体 ②《史记》—研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57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史记二十讲

张大可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100-09391-0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640×980 1/16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0

定价:122.00 元

# 目 录

## 系列讲座

- 第一讲 导论：《史记》的民族凝聚力与研究现状 ..... 3
- 第二讲 《史记》是一部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 ..... 37
- 第三讲 《史记》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 ..... 52
- 第四讲 《史记》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 68
- 第五讲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 79
- 第六讲 司马迁的写人艺术 ..... 96
- 第七讲 司马迁悲壮抒怀 感动读者两千年 ..... 111
- 第八讲 秦汉之际天下三嬗  
——司马迁笔下的陈胜、项羽、刘邦 ..... 136
- 第九讲 长风呼啸 马蹄声碎  
——司马迁笔下的楚汉相争 ..... 152
- 第十讲 秦皇汉武 千秋评说  
——司马迁笔下的雄主 ..... 181
- 第十一讲 西汉盛世时期的三大冤案  
——司马迁笔下的政治斗争 ..... 196
- 第十二讲 能屈能伸大丈夫  
——司马迁笔下的雪耻故事 ..... 215

第十三讲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司马迁笔下的妇女形象 .....	227
第十四讲	司马迁的进步思想 .....	244
第十五讲	司马迁 ——大一统时代的文化巨人 .....	258

## 专题讲座

第十六讲	司马迁写傲倪英杰 .....	275
第十七讲	司马迁笔下的明君贤臣与开明政治思想 .....	294
第十八讲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	305
第十九讲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思想 .....	324
第二十讲	寻找司马相如 .....	341
专题论文：	中国古代一部开明的治国宪法 ——《尚书·洪范》解读 .....	366

## 书序、书评

一、《史记》论著书序 .....	395
《史记新探》序 .....	395
《史记学概论》序言 .....	405
《史记笺证》序 .....	408
《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续篇》序 .....	415
《司马迁与韩城》序 .....	419
《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序 .....	421
《史记散论》序 .....	430
《司马迁及史记论稿》序 .....	434
二、《史记》论著书评 .....	440
《史记评议赏析》评介 .....	440

《太史公书研究》评介 .....	448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评介 .....	454
《史记的学术成就》评介 .....	459
<b>附录：引人入胜的讲座</b>	
——《史记十五讲》评介 .....	465

# 系列讲座

**【说明】**2010年3月至9月，作者应国家图书馆之邀作客“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所作的专书典籍讲座，凡十五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史记十五讲》为书题与讲座同步在当年2010年4月出版，收入国家图书馆“讲座丛书”第二编第六辑。过半讲题系作者《史记研究》专题论文转化而成，本次收入个人文集，为了保持系列讲座的完整性，凡转化为讲座的专题论文从《史记研究》论集中删除。



# 第一讲 导论：《史记》的民族凝聚力与研究现状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有着崇高的人格、坚强的毅力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中国古代通史，即纪传体《史记》。这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并且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和研究它，都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从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体系，即“史记学”。司马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光荣，给华夏子孙留下了一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倡导新史学之际，十分推崇《史记》，并提出把《史记》引入高校课堂的远见卓识。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史记学”研究分为大陆与台湾地区两支发展，各自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史记学”形成鼎立格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史记学”研究迅猛发展，已持续了近 30 年，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成果以加速度的趋势递增，许多高等院校开设了专门的《史记》课，有的高校还成立了《史记》研究室。这些都标志着当代《史记》研究步入

了一个黄金时代。适逢其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

## 一、《史记》的民族凝聚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史记》之树生命长青，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具有无与伦比的凝聚作用。这一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地位，使《史记》成为中国人的根柢书。司马迁的思想、精神、人格对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不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就不知文化研究从何谈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记》日益走向普及，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由古及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长串的名流学者涉足这一领域。汉代学者班彪、班固父子，文献学家刘向、褚少孙，哲学家扬雄、王充；唐宋文学八大家，史学家刘知几、郑樵，哲学家程颢、程颐、朱熹等数十人；清代的考据大家与文史哲各界学术泰斗如顾炎武、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万斯同、王念孙、阎若璩、章学诚等，不胜枚举；近代的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胡适、鲁迅、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钱穆、施之勉、朱东润、程金造、陈直；以及杨向奎、钱钟书、蔡尚思等也为大家所熟知。据统计，历代以来，研究《史记》的作者 2028 人，留下的论文有 4000 余篇，著作 293 部，总字数 1 亿 2000 多万字，这是其他古籍研究不可比拟的。《史记》日益走向普及，生命之树常青。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当代《史记》研究更是一个热门课题，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持续在百篇以上。对 1980 年到 2008 年 30 年间不完全的数据统计，论文论著作者达 1161 人，发表论文约 3000 篇，出版论著 151 部，总字数 6000 余万字。当代 30 年与历代 2000 余年总量相比，论文占 70%，论著占 52%，总字数占 52%，作者人数占 65%。综合评估占总量之半。当代文学、史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各界无不涉及《史记》研究，阅读欣赏的人也日益增多。《史记》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它的生命之树为何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史记》是一部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这将在下一讲做专题讲座。此外，

它还有四大特点，分述于次。

### 1. 民族文化的浓缩

第一，《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已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楚汉春秋》等史书，但所记载的历史史事范围狭窄，内容简单，历史被看成统治者个人的活动，因而缺乏广泛的社会意义，且诸史均只记叙相应时代的史事，没有一部是贯通古今的历史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需要，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 3000 年的通史，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的，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知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

第二，《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文献整理。《史记》取材广泛，“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会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这正是奠定了《史记》作为“百科全书”的基础。从文献整理角度，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是文献运用的最高形式，也必然是发挥历史文献功能的最好手段，非通才大家不能为。司马迁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成为后代史家的典范，所以《史记》成为各科学习的根柢书。

第三，司马迁第一次叙述了全社会全方位的历史，不仅将社会各色人物及人民群众叙入历史，而且创立了民族一统思想，第一次记载了各民族的历史。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各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纲常伦理学说，也被推广到民族关系上来。董仲舒认为，诸侯不能与天子平等，大夷小夷不能与华夏族平等，甚至各民族之间小夷也不能与大夷平等，说什么“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sup>①</sup>。而司马迁

<sup>①</sup> 《春秋繁露·精华》。

却在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不仅在《史记》中为百家学说留一地位，而且首创各民族史传，计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五篇。司马迁将东西南北各民族均视为天子臣民，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把记述各民族的列传与各人物列传等列编撰，表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表达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走向统一的主题。东越反秦佐汉，参与中原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司马迁特别加以记载，表现了他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革命”的权利。这一思想在当时是独步史坛的。

此外，《史记》还写了《大宛列传》，记述中亚各国的历史，留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从而赋予《史记》以世界史的内容。由此可见，《史记》走向世界不是偶然的。

## 2. 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

司马迁熔铸于《史记》叙事中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内涵，是一种民族特征在文化上的表现，它表现了共同的社会心理追求，如主张国家、民族统一的历史观；主张贤人治国，反对暴政的政治观；主张农工商虞并行发展，人人致富的经济观；主张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承认人欲并重义的义利观；主张德才兼备、自奋成才的人才观；等等，这都是中华文化民族传统的精品。尤其是大一统历史观，中华民族共认一个始祖黄帝，这一观念所产生的民族凝聚作用，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足见《史记》的进步历史意义。

## 3. 历史与文学的成就遗泽后世

《史记》作为历史书，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体大是指《史记》的五体形式，囊括中外，贯通古今，内容丰富，无与伦比；思精是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和进步性。《史记》所述历史内容表现的社会结构，以人为主体的，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是首次体现历史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发展史。《史记》全书，记载了4000多个人物，专传人物100多，五体中记载人物的篇目达112篇。以人为中心，就要写出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从而锤炼写人艺术，创造了历史与文学统一的

范例。所以，《史记》的纪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又是传记文学的典范。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不是记流水账，而是选取生活中典型的事迹，突出人物的特点。在司马迁笔下，人物个性鲜明，一个个呼之欲出。司马迁之所以能成功地完成历史人物的典型塑造，这是从属于他的理想的。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写历史，其目的就是要用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来警醒世人，寓褒贬，别嫌疑，明是非，使社会各色人物都能在《史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以史为鉴，培植自己的人生。所以《史记》行世，长盛不衰，成为人们提高素质、锤炼修养的必读教科书。《史记》创造历史与文学统一的艺术价值可供人们欣赏，也是它生命之树常青的原因之一。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揭示了个中道理。

#### 4. 崇高的人格，创新的精神，激励人生奋发有为

司马迁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sup>①</sup>三立精神就是司马迁的人生观。他由于受李陵之祸而痛不欲生，但想到《史记》未完成，又坚强地活了下来，将全部愤怒倾注于《史记》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一段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如果人的一生，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与黑暗进行抗争，就如同“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和《伯夷列传》中，引圣人孔子之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父亲司马谈的临终遗言：“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立身扬名为孝道的最高准则，这是司马迁借父亲之口提出的新颖见解。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立名为核心的荣辱观，司马迁又将其上升成为“发愤著书”说。其言曰：“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

<sup>①</sup> 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二六《与挚伯峻书》。

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氏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sup>①</sup>司马迁感情激荡，如波涛滚滚，一泻而下，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血倾注在《史记》之中，成为“一家之言”。司马迁于是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

司马迁的人格是崇高的，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作出一番大事业来。这一认识不但激励了自己，而且也启迪着后人深思。他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就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自己成功的伟大创作，更成为人们学习的样板，因而《史记》的生命之树常青。

## 二、当代《史记》研究的特点

当代《史记》研究是指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间的“史记学”发展。《史记》问世以来2000多年的“史记学”发展，大体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古代，从汉至清末，时间跨度2000年；近代，从1905年到1949年，时间跨度45年；现代，从1950年到1979年，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当代，从1980年以来。阶段的划分是按《史记》研究成果的内容所含时代性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为依准，只代表一家之言。当代《史记》研究已历30多年，还未达到顶点，再过数年，划时代界碑工程的完成，是当代《史记》研究达于顶峰的标志。中国史记研究会正在推出的《史记疏证》工程，是集历代《史记》研究大成的界碑工程，可望在2015年前后完成。

《史记》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古代与近代为传统《史记》

<sup>①</sup> 《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研究，偏重微观，在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下功夫，方法是抄撮材料，排比引证，集甲说乙云，这就是传统注疏与乾嘉考据的治学方法。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是传统方法的一个界碑。近代研究是一个过渡时期，仍侧重“文献研究”，对《史记》的宏观研究已引起了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半个多世纪是文史工作者运用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史记》的新时期。由于政治起伏，形成了前30年与后30余年《史记》研究的不同局面，因而分为现代、当代两个时期。前30年，即1949年至1978年，因“文革”运动的中断，实际只有1951年到1965年共15年。时间短，一代新人未成长，又是新方法运用的发轫期，大家还很不熟练，论著多以普及读物为主导，一般是小册子。老一辈学者作出贡献又具有时代界碑价值的成果，值得称道的论著有七种，即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959）、贺次君《史记书录》（1958）、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1963）、陈直《史记新证》（1979）、钱钟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1979），以及白寿彝的《司马迁与班固》（1963）和《史记新论》（1981）。前五种均属“文献研究”的范围，只有后两种白寿彝的论著是运用唯物史观与丰富史料相结合的宏观研究，在学术界作出了示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史记》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是2000多年来“史记学”的发展高峰，在此予以重点评述。下面从研究特点与发展趋势两个方面来谈。先说当代《史记》研究的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

### 1. 唯物史观的方法

古代传统研究对司马迁“一家之言”的思想只有零星的探索，而且立论肤浅，例如“史公三失”，争论2000年也没把它说明白。明清评点家对司马迁思想不乏精到见解，但总体上却是偏重辞章技巧，因而陷入寻章摘句中，同时，又刻意追求史公微文，往往断章取义，任情附会，脱离历史实际。这是缺乏唯物史观就事论事的必然结果。当代学术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

把司马迁的写作活动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揭示了司马迁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且能够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分析这种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看出物质生产发展是这种关系的根源。这种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考察司马迁思想的方法，在20世纪50—60年代，人们还很陌生，对司马迁思想的考察忽左忽右。20世纪50年代有拔高的倾向，如说司马迁是“人民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等。到了20世纪60年代，则出现了贬低的倾向，如有人认为，司马迁的历史观，只不过是“英雄史观、历史循环论、神学史观等糅合于一体”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体系”，他“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所宣扬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等等。唯物史观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宽松的学术氛围中为新一代论者所普遍掌握，推动了“史记学”的迅猛发展，论说理据充实，平允中肯，标志着研究者思想理论的成熟。

## 2. 纵横比较的方法

古代的《史记》研究，比较方法局限于马班异同。当代的《史记》研究大大开拓了比较的范围，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史记》篇目自身的比较，提示司马迁运用互见法的成绩。其二是将《史记》与前代、后代的史学和文学作比较。《史记》与前代的比较，如《史记》与《春秋》、《左传》、《战国策》、诸子的比较，与《离骚》、《楚汉春秋》等的比较，探索司马迁对前代思想及资料的继承；《史记》与后代的比较，除与《汉书》外，还与《资治通鉴》以及政书、戏曲、小说作比较，探索司马迁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明清评点家已将《史记》与小说比较，不过大都是札记性质。当代全面系统地探索《史记》对后世传记及小说的影响，成为文学界研究《史记》的一大主流，论文论著都不少，占当代《史记》研究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其三是将《史记》与国外的史学著作比较。齐思和在1956年1月1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一文，是第一篇运用历史比较法将《史记》与希腊史学名著



对比，分析了“《史记》的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简明地表述了《史记》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这种比较研究日渐成熟，如李少雍的《司马迁与普鲁塔克》<sup>①</sup>、黄新亚的《论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sup>②</sup>、刘清河的《从〈旧约〉与〈史记〉的比较试探东方文学的一点规律》<sup>③</sup>、夏祖恩的《试比较司马迁与修昔底德的经济史观》<sup>④</sup>等文，颇有创见。诸文比较的结果是，司马迁在知识的积累、认识的深度、表现力的强度方面，都是同时代东西方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因此，司马迁不仅是汉代的文化巨人，而且可以说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文化巨人。

### 3. 各种新方法的借鉴与运用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国外的文化传入中国，有新学科的传入，有新方法的尝试。如系统论、价值论、艺术辩证法等都运用在《史记》研究上。徐兴海的《史记所体现的系统观》<sup>⑤</sup>、党丕经的《论史记的史学框架》<sup>⑥</sup>，就是运用系统论分析《史记》整体结构和史学框架的尝试。艺术辩证法运用广泛，除了分析《史记》实录与人物塑造的关系的许多论文外，还有宋嗣廉的《史记艺术美研究》、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等论著也作了成功的尝试。技术性的现代化手段，如李波等编制的《史记索引》就是利用微机处理《史记》原文取得的成果。运用计算机检索较之传统手工检索不仅速度高出几百倍，而且准确无遗漏。

### 4. 文献与考古相结合

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运用于《史记》研究，首推王国维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王国维和郭沫若都运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生卒。利用考古材料全面论证《史记》的

① 《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② 《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③ 《汉中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  
④ 《福建论坛》1987年第6期。  
⑤ 《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  
⑥ 《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